

許志英 ● 著

# 五四文學精神



五四文學精神

許志英著

· 江蘇文藝出版社

## 五四文学精神/许志英 著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

1168×850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190,000 199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

标准书号：ISBN 7—5399—0285—X/I·273

定 价：4.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增强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感·····        | ( 1 )  |
| 现代文学与文学现代化·····          | ( 8 )  |
| 评冯雪峰关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论述·····  | ( 28 ) |
| 新青年——新潮社·····            | ( 47 ) |
| “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与人的文学·····     | ( 90 ) |
| “五四”新文学反帝主题的初步形成·····    | (111)  |
| 中国农村的面影                  |        |
| ——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管窥·····      | (125)  |
| 从现代小说的风俗画谈起·····         | (147)  |
| 历史与现实之间                  |        |
| ——二十年代历史题材创作片论·····      | (151)  |
| “五四”——“左联”时期散文发展的轮廓····· | (171)  |
| 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思想倾向·····       | (185)  |
| 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       | (209)  |
| 继往开来                     |        |
| ——评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 (232)  |
| 贵在适度                     |        |
| ——评《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      | (239)  |
| 《觉悟》《学灯》《晨报副镌》和          |        |
| 《京报副刊》的终刊日期·····         | (244)  |
| 后记·····                  | (252)  |

## 增强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感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年的现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它既同古代文学、近代文学有联系与区别,也同建国后的当代文学有联系与区别。而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如果仅仅从文学本身的继往开来关系加以探讨与考察,虽能说明一些问题,但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从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变动以及变动后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的特点等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与研究,才能准确地揭示与把握现代文学的历史特征。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列宁指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sup>①</sup>。将历史现象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放在“基本的历史联系”中进行考察,深刻地揭示历史现象发生、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真实风貌和客观规律,并准确地估价其得失与影响,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历史感。

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是有重要成就的,特别是近几年来,

---

<sup>①</sup> 《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在不少方面都有明显进展。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正酝酿着全局性的突破。可是，也不能不承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其历史感问题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缺陷。

文学史的编写，本来最应该显示出文学发展的历史感的。但是最近几年正式出版的七、八种现代文学史著作，却在这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这些著作的体例大同小异，差不多都采用所谓“板块结构”，即文学运动加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的叙述的历史感还稍强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介的历史感就很弱。主要问题是视野不够开阔，过分着眼于单个对象的完整性，不论大小作家的评介都力求面面俱到，四平八稳，一部文学史几乎成了作家作品论的汇编。而且评介的方式又大致相同，从作品的主题思想谈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最后交代几句艺术特征。这样孤立地静止地就事论事地评介作家作品，就很难显示出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而文学史往往成为一个一个作家作品的简单排列与堆砌，当然看不出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更看不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学史上任何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再如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演变、艺术形式的发展等等，也都是有迹可循的。可是我们的文学史著作，一般都未能从广泛丰富的“基本的历史联系”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史的追根溯源、瞻前顾后的考察，自然难以显示出历史感。

这种情况在不少单篇作家作品的论著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些研究某个作家作品的论著，鼻子底下往往只有这个具体对象，未从这个对象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社会思潮、时代风尚等等的联系中，阐述作家思想发展的轨迹、创作道路演变的规律、作品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等等问题，也未对这个对象的左邻右舍的关系进行起码的比较研究，说明作家的创作个性、贡献

和影响。人所共知,《阿Q正传》是少有的伟大作品。但在谈它的影响时,一些论著只简单交代一下它被译成多少种外文,而对它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则缺乏具体阐述。其实,只要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王任叔的《疲惫者》、蹇先艾的《水葬》、王鲁彦的《阿长贼骨头》等小说就受了《阿Q正传》的影响。运秧驼背、骆毛、阿长的形象塑造分明受到阿Q形象的启迪;特别是《阿长贼骨头》,连亦庄亦谐的笔调和结构方式,也师承《阿Q正传》,虽然功力不深。对于鲁迅小说的研究是现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最为显著的,情况尚且如此,别的例子自然不必再举了。

近几年来作家传或评传的写作,蔚然成风。传记的写作,如何体现出历史感,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些传记力图将作家置入时代的激流和新文学的流变过程中,评述其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可是大部分传记,只是孤立地平面地记述作家生平经历,勾勒创作概貌,很难看出作家赖以成长、发展的社会、生活与文学的环境,也难以看出作品是在怎样的现实生活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其艺术渊源、社会影响等又是如何。

由于在历史感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缺陷,不能不给现代文学研究带来某些限制甚至消极影响。长期以来,在不少方面现代文学研究未能从一般的文学评论模式中解脱出来,这就难以从总体上本质上把握现代文学的历史风貌和基本特征,难以历史地具体地揭示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和演变规律,难以真实地准确地说明大量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发展的脉络和得失影响。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影响了这门年轻学科更快地提高。

增强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感,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将现代文学研究纳入历史研究的轨道。历史研究既然是一种以历史为对象

的理论研究，因此必须增强理论修养，同时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素材，才会在广度与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传统是一种惰力。突破传统既需要理论勇气，更需要足够的准备。譬如说，要改变文学史写作中孤立地评述作家作品的现象，就不是那样轻而易举。应当注意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如果说一个作家或作品是文学史上的点，这个点不应该是孤立的，而是线与面的有机部分。应当从点在线与面上的作用来确定和表现点的地位，而这就要求我们心中要有线与面，如果对线与面茫然无知或一知半解，那还是会见点而不见线、面，就是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文学史上评论作家作品，主要应当着眼于作家作品的成就、贡献与影响，就是说着眼于作家作品给文学史增添了哪些新东西。《子夜》与《家》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但它们给文学史增添的新东西不一样，评述时就不能采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子夜》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别开生面地提供了过去少有的资本家形象，同时将现代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推进到成熟阶段；《家》则深化了“五四”文学的反封建主题，同时成功地塑造了不同个性的青年一代的形象。如果主要着眼于此，从历史发展高度加以评述，就会显示出历史感。在现代文学史上，需要完整叙述的作家应当仅限于为数不多的有杰出成就、贡献和影响的作家。一般作家只应以其有某种贡献的作品进入文学史，似乎不必保持作家的头尾的完整性，而对作品进行评述时也不必面面俱到，应着重评述其别人不能替代的独特之处。这样既容易显示出作家各自的特色，也容易有历史感。

文学史不仅应当对作家作品作出具有历史感的评述，还应当对一些复杂问题，诸如一些作家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作出富有历史感的阐述。过去将无政府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



简单地将一些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作家，当成无政府主义者兴师问罪，并全盘否定那些受有这种思潮影响的作品。而现在将无政府主义看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这自然是正确的），则在无政府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之间简单划上等号，又不加分析地肯定那些受有这种思潮影响的作品。两种意见虽大相径庭，而根源却又大致相同：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就事论事地评论问题。在“五四”时期以及稍后一段时期，无政府主义对许多作家都产生过影响，这是历史事实。如果说在“五四”时期以无政府主义作为思想武器进行反封建斗争，主要起的是进步作用；那么在“五卅”前后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情况就比较复杂，既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又有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消极影响（这是就总的情况而言的，具体评价因人而异）。还应当看到，作家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和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表现，也不能简单地等量齐观，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表现，更多的是人物形象的一种对无政府主义献身精神的崇拜，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作家的褒贬态度。对这类问题，简单的否定或简单的肯定，都不能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重要的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历史分析。

增强传记的历史感，似应从增强传记的生活实感入手。传记是对作家的生平、思想与创作进行综合评述的著作。它与一般的作家论既有相同之处，如都要对作家的思想发展、创作得失、风格特征等问题作出有分量的评述。也有不同的特点与要求。传记作为一种饶有兴味的读物，需要以生动的笔触扼要记述作家的日常生活。这自然不必故意以一些秘闻逸事的渲染来招徕读者。但是任何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社会人，都有自己的亲朋故旧、交往应酬、七情六欲、兴趣嗜好，审慎地有选择地表现这些，不仅可

以增加读者阅读的兴味，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多方面表现作家的个性，增强传记的生活实感。现在有些传记，写得干巴巴，缺乏丰满的血肉，笔下的作家似乎是在真空中独来独往，成天价不是在孤独地战斗，就是在日以继夜地创作，将本来各具个性的作家，纳入到一个固定的模式中去了。增强传记的生活实感是增强传记的历史感的一个方面，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的生活，都不能不打上一定的历史的印记，在一定程度上反射出特定的时代心理、气氛和风尚。当然，增强传记的历史感，还应当从大处落墨，将作家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文化思潮和文学环境之中，在广阔的背景上多侧面多层次地表现作家的人格和文品。这样，作家的存在，就不是孤立静止的，抽象干巴的，而是具体流动的，血肉丰满的——这正是传记所应该追求的。

如果从广阔的历史联系中，研究现代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文学现象（社团流派的兴衰、文学思潮的起伏、创作方法的演变等等），有助于增强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感。但是难度较大。即使是对于某种更具体的文学现象诸如“五四”时期的问题文学思潮、二十年代末兴起的革命加恋爱的主题、《华威先生》出现后的暴露与讽刺倾向的研究，也要掌握这种现象本身的发生、发展的大量材料，还要熟悉当时的政治状况、社会思潮、时代风尚，既要有鸟瞰式的视野，又要有进行综合分析的理论素养。这样才能对问题作出具有理论高度和历史深度的说明与论证，从而显示出历史研究的历史感。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编写文学史和撰写作家论，很少有对较大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的经验积累。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对突破现有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提高整个学科的研究水平有积极作用。

增强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感，说到底是一个坚持与运用历史

唯物主义原则的问题。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多灾多难,受到各种干扰,解放以后主要是受到“左”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在“革命”的名义下一次一次的批判、“再批判”(固然偶有批之所当批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则选错了靶子),不仅大大缩小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人为地设置了不少禁区,而且对一些历史现象作出了“左”的随心所欲的解释。前几年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在清理“左”倾流毒上成绩是显著的,但仍不彻底,在某些问题上人们还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本来就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结论,因此增强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感,必须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前提下,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清理“左”倾流毒。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就是说反“左”要防右。事实上近几年来在对某些复杂的文学现象的理解与评价上,也不时有右的苗头出现。这同样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

## 现代文学与文学现代化

---

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现代文学的范围、起迄时限以及总体特征、性质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是近年来的事。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突破原先的研究格局，走向深入的重要表现。

在现代文学历史分期问题上的各种新的区分法，意见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认为以前的“现代”概念专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确立这一概念的解放初期以及以后一段时间，是合理的可行的，现在看来则未免过于狭窄，不利于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拓展。而各种区分法所掌握的标准却不大一样，概括起来大致情况是这样，一种是以社会历史重大变革、社会性质发生变异为划分标准；一种是以文学的划时代变革、文学的总体风貌、特征与性质为划分标准。因为掌握的标准不同，而出现众说纷纭的分期意见，目前不可能统一，也没有必要强求统一。

我个人持后一种划分标准，主张将原先的“现代”、“当代”打通，即将“五四”以来的文学统称为现代文学。因为我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其实是最简单的事实：从“五四”时代开始的现代文学史实质上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曲折历史；现代化也是现代文学的总

体风貌、特征与性质。

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①</sup>现代文学史也应该是这样，它不是规定作家为自己的自然发展服务的“特殊的人格”，它是作家作为一个整体所进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学追求的客观记录。而这种文学追求，即现代作家活动的总体目的，只能归结到文学的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的现代性。以前我们看作现代作家的使命与追求的东西，如反帝反封建、文学大众化、为现实服务等等，不论实践的功过得失如何，似乎只能属于文学现代化中有关现代意识方面的具体问题，远非涵盖面最大的理论概括。

## 二

我们说现代文学史既然是文学现代化的历史，那么确定它的起迄时限、期段就应以文学的现代化规程为主要依据。

我们不同意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也不同意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贯通起来统称为“现代文学”，是因为这些提法完全抹煞了“五四”时代之于文学现代化的决定性意义。而历史恰恰作了这样的安排：“五四”文学革命是我国文学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标志；于是理所当然地，“五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现代意识的获得对于文学现代化——现代文学的开启的意义。有人据此提出“二十世纪文学”的崭新论点，认为戊戌变法思想、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在内的现代科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学思潮的逐渐被接受，是国人获得西方型现代意识的开始，文学因而与古代传统发生“全面的深刻的断裂”。此说对纠正文学史界一向怠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对其历史功绩和深远影响估计不足的状况，无疑是极为有益的。但从现代意识角度讲，此论未必精当。自从列强的大炮轰开国门后，我国的有识之士就一直在向西方寻找真理，吁求着用先进的西方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冲击、改造古老的中国肌体。他们从来就是以有限的现代意识呼唤着更先进更开放的现代意识。从近代史看，现代意识的发展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鸦片战争起始，到甲午战争失败。中国人承认西方“船坚炮利”，而欲富国强兵，这是现代意识物质层面的表现。这时文学上的现代意识尚处在微弱的萌芽状态，张维屏、魏源等的诗作中的忧患意识，已不再象古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那样往往与忠君意识水乳交融了，而与民族民主意识联结在一起。这是历史的进步。

第二阶段，从甲午战争失败，到爆发辛亥革命。中国人从“器物”科技上承认不如西方，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sup>①</sup>，因而演出了一场推翻帝制的壮举。这期间，现代意识在物质层面与心理层面的结合上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维新派介绍了诸如进化论这样的西方科学意识，对于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科举制度进行了大的冲击，其功不可磨灭。但他们还不可能彻底否定传统意识，搞的是“托孔改制”，穿起古代衣衫抒发现代心声。这里有一个勇气问题，但主要还是现代意识的储量有限。资产阶级革命派忙于国体、政体的变更，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少有建树。因此，这时在

---

①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意识形态领域的全局上，现代意识没有也不可能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远未渗入到一般的文学表现中，也没有对文学的发展、文学面貌的改观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那时的文学观念没有真正取得现代化的独立地位。文学还被认为是工具性的，是政治或思想的附庸或外壳。“我手写吾口”、“崇白话而废文言”等先进的文学主张，说到底还是强调了文学的实用性，无法推演出全新的现代文学观。小说一度受到特别重视乃因看到了它与“群治”、与“社会改良”的密切关系。一些改良主义者和有一定现代意识的作家从语言、文学形式开始了尝试性的、幼稚的现代化努力，而一些革命家却几乎忘记了文学，在文学观念和创作上体现出难以原谅的保守。从那时文坛上，人们也许可以举出三两篇略具现代性的作品来，也许能找到反映文学现代化要求的片言只语来，但真正以现代的文学观念表现出真正现代意识的现代文学那时并没有出现，当然也就远远没有成气候。历史提出了任务，但完成任务的条件尚不成熟。这时最值得自豪的是鲁迅等革命民主主义文化战士的崛起。他们的通过“立人”达到“立国”的主张，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对“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唤，在“别求新声于异邦”时显露的民主主义文学观，都成为“五四”现代意识大觉醒的先声。他们属于未来的时代。他们的努力虽未在意识形态领域扭转乾坤（主要是缺乏有力度的作品支撑自己的理论），但这毕竟是黑暗王国中耀眼的光明。

第三阶段，从袁世凯窃国，到《新青年》创刊。这三、四年间，与政治低潮相适应，文化上尊孔逆流空前泛滥。戊戌时代的维新志士康有为、严复等也都作为政治保皇派、文化复古主义者，为尊孔复古逆流推波助澜。资产阶级文学改良成果几乎荡然无存。现代意识被淹没在复古逆流中，难以显现新的雄姿。历史出现了

令人窒息的郁闷，令人痛心的曲折。也正是在这时，一代民主主义战士“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清醒地意识到革命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sup>①</sup>于是，适逢其时，《新青年》横空出世，揭开了中国文化新时代的序幕。

从现代意识在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极其简单的回顾中，我觉得无论是以鸦片战争为界，还是甲午战争或戊戌维新为界来确定现代文学的上限，似乎都缺乏足够的论据，自然也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从近八十年的近代史的进程考察，现代意识还处在量的逐渐积累过程中，质变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因而也难以找出划时代的令人信服的重大“界碑”。现代文学只能带着深深的惋惜越过这片贫瘠的土地。

现代意识能够真正立住阵脚，发生广泛社会性、时代性的影响，既要有客观条件——“五四”时代具备了这种条件；还必须要有对传统意识进行全面反思的主观条件——“五四”时代也具备了这种条件。时代造就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民主主义战士。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汲取了外国社会思潮、哲学思潮和文学思潮的营养，“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sup>②</sup>他们毅然向传统意识举起了投枪。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意识是复杂的，儒家的思想规范和文化观念是其主体；这种体系完备、根深蒂固的意识只有在“五四”这个思想大解放、价值大变革的时代才能逐渐失去其统治地位，只有在人们明确而响亮地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的口号时

---

①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② 鲁迅：《坟·后记》。



才会逐渐失去普遍的社会趋奉心理，只有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才能彻底被时代的弄潮儿所拒斥。如果说“五四”以前西方现代意识已经在中国开了源头，那么到“五四”才真正汇成巨大的、浩浩荡荡的洪流。这时，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在广阔的领域中展开了激战。在对中西文化整体结构的深入解剖中，先驱者进一步发现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在一片西优中劣的价值判断声中，从而得出必须彻底与腐朽的传统决裂、以西方模式构建中华文明的结论。于是，现代意识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扩大了影响，坚固了营垒；不只是在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中传播，而是冲击着、改变着广大知识界乃至市民阶层、劳动阶层的精神世界。作为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形象反映物，文学至此当然体现着现代意识的必然要求，当然要以现代意识为崭新的内容质地，而且也只能在这种条件下进入它的现代历史。

文学的现代化最内在的内容是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实际上是现代意识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大成果也正是在这方面。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是彻底否定旧文学观念的宣言书，他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代表了现代文学观念的最早正式形成。此后又有李大钊的“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相融合的“社会写实”文学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鲁迅及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创造社为代表的“自我表现”、“艺术独立”的文学观；胡适之的白话文学观和傅斯年的“欧化国语文学”观等等。在我们习惯用反帝反封建来概括现代文学本质的时候，我们往往未能对这些复杂丰富的文学观念作一番抽象、概括，事实上很难用“反帝反封建文学观”或“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观”来概括它们且概括得十分准确。但从文学观念现代化的视角上概括它们就比较确切。